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夏书章

自选集

XIA SHU ZHANG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夏书章 | 自选集

XIA SHU ZHANG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书章自选集/夏书章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3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477-3

I. 夏… II. 夏… III. 行政管理—文集 IV. D0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241 号

责任编辑	倪腊松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477-3
定 价	56.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黄尚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李夏铭	张小杰	杨以凯	陈海烈
林海华	金炳亮	曾少华	颜泽贤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夏书章

1919年1月生于江苏高邮。早年先后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获法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立陶尔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今肯尼迪政治学院），获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曾任江苏省立江苏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原国立中山大学（今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哲学系副主任，校副教务长，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副校长。出版著、编、译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所获奖项有：国家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东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EROPA）“卓越贡献”奖，美国公共管理学会（ASPA，曾译行政学会或行政管理学会）2006年国际奖（International Award）。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著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学术自传：我与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及其分支或 相关学科

前 言

按照出版单位的正式通知，“文集”的作者除选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25 万字左右和整理个人著（译）作及论文索引之外，还要撰写 1 万字左右的个人学术自传。看来，这是统一规格，似乎不好推辞。当然，要认真做起来，工作量可不小，得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现在正忙于其他不少预先接受安排的和经常性的各项任务，时间已经很紧，所以曾感到有点为难。但是，转想借此机会，趁记忆力还不太差的时候，把这一辈子至目前为止的几十年或大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进行一番比较系统的回顾，也是很有意义的事，于是欣然命笔。

作为“学术自传”，内容自然应以与“学术”有关者为主。其中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受教育和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情况，以及同国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团体所发生的联系。一般传记体裁的文字，常以依时间顺序来叙述为宜。不过，对有些互相交叉又需要相对集中地处

理的事项，也无妨适当地给以提前或推后的灵活性。如各个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便不能不如实反映其变化，发展的来龙去脉。又如在标题中所明确提出的是两门学科，即主要学术活动所属门类和范围，而实际上决不止此。时间长了，接触的面也就会随之拓宽。这一点可以从“索引”中得到佐证，不拟详及。

一、新中国成立前所受的教育和担任的教学工作

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总是来源自或植根于所受的教育，即以所受的教育为基础。而学术生涯的开展，则不外从事教学研究，或立足于专门研究机构，或成为学术研究的“个体户”。我的情况属于前者，虽也有研究机构聘为研究员，那一般只是有名无实的兼职而已。

（一）新中国成立前所受的教育

家庭教育的影响不大。母亲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虽有相当的文化背景，写得一手好字，但在我高小毕业前就去世了。同时，我自高小五年级起，一直离开家乡在学校寄宿，初中以后更走出县境，跑了不少地方，所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我的影响要大得多。

先说社会教育，主要是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会现象所作出的或明或暗的演示，对于我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有着潜在的和深刻的推动作用。记忆犹新的一件大事，是在8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家乡小镇上，突然来了上千的败兵。那是被“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穷追猛打的队伍。败兵边抢掠边逃窜，既凶残又狼狈。过了好几天，才见到轻装的百人左右的“北伐军”，毫不扰民，

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这两种军队对比分明，长大以后方知“北伐军”中的骨干主要是共产党人。

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我已读初中（关于学校教育随后再说），那时的最高当局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还对坚持抗战主张者进行打压、迫害，是极不得人心的。在读高中时，关于在江西“剿共”的事和红军“长征”的情况等，尽管封锁消息和不时作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歪曲报道，但毕竟是“纸里包不住火”，真相仍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现象也随处可见。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此，内地、边缘地区可想而知。

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南京。形势急转直下，非官方的舆论明显一致倾向于肯定共产党的凛然大义。紧接着的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全面抗战的开始，我在抗战时期考进大学。如果以在大学所选专业学科为学术生涯的起点的话，那么从在这以前所受社会教育来看，希望国家富强和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比较集中和强烈。没有向谁咨询、请教，完全是“自作主张”地选择了“政治学”这门以为可寄厚望的学科。

再说学校教育。初小在家乡送驾桥（现称送桥），高小在高邮县（现为市）城，初中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因家贫辍学未读初三），高中在南京一中（同等学历考入因抗战仅读两年）和江苏省兴化中堡庄临时高中（三年级）度过，都在江苏省内。这些是在考进大学前的应受教育，选择专业学科是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时的事。据师友们的预期，我将报考当时比较“吃香”的理工科或经济学系。但使他们惊奇的是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国立

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政治学系。除前述社会因素外，在学校读书接触到“治国平天下”、“上医医国”等思想，也有较深的印象。

说到对大学专业学科选择的考虑，在中、小学阶段还有两支小插曲也许不无联系。一是在高小毕业前，学校设计的课外活动中有一项以校园为“市”的方案。我曾当选为“市长”，还认真像煞有介事地干了一“任”。二是在初三辍学期内，南京《首都学生》期刊征文，我写的一篇《我的故乡》获得第三名。那算不得论文，有点调查研究性质，指出了社会有待改革之点并有所评论。与中学作文有所不同。

在大学本科，我读的是政治学系。就全部课程来看，大致可分三类：一是理论（包括历史、制度等）；二是国际（包括外交、国际组织等）；三是行政（包括市政、行政法等）。由于兴趣较浓的是“治”，所以选修课即侧重于行政方面。《大学国文》课程的作业开始与专业内容结合，但仍不明显。比较“正规”的是一篇关于“论抗战总动员”的文章和题为《德国从民主到独裁的剖视》的毕业和学位论文，都是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理论知识去完成的。

到了研究生阶段，选定行政学为专攻方向非常自然。我进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立陶尔行政学研究生院（Public Administration 现多译作公共管理，该院于20世纪60年代已并入后来新办的肯尼迪政治学院，原院名保留于一项教育计划），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较多注意预算制度和城市管理，也曾到州政府实习和经常访问所在市政府并参观市政设施。一个很便利的条

件，是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恰好是该市的“市经理”（city manager）。那是美国流行的一种市政体制，主管市政业务，相当于掌握管理实权的市长或副市长。我的毕业和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战时地方政府》，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时，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有好几个月之久。八年抗战胜利的喜悦，难禁归心似箭，就没有再继续“深造”了。

（二）新中国成立前担任的教学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的教学工作是小学、私塾、中学和高等院校都有。初三辍学时曾在初小代课，抗战初期曾在县小任教和到农村临时新式学塾教书，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教过一个学期。当然，与学术生涯联系较紧的主要是高校工作。所以中、小学等情况从略，把重点放在高等院校方面。也由于在高校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最长，又担任过各级行政领导工作，所以除专业教学研究的内容外，又兼及对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那是后话，这里只是顺便先“点”一下“题”。同时，在广义的公共管理领域，高等教育管理也是一个重要部门，进行研究，不仅没有出“格”、过“界”，而且正好对“路”、合“拍”。

第一所聘我为副教授的高校是江苏省立江苏学院。作为专职教师，我在该院政治学系讲授过政治学、行政学、市政学课程，还为经济学系开设过管理学课程。当时的政府当局正热衷于打内战，社会经济形势开始恶化。物价猛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公务员和教师的生活日益困难。我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写了几篇带有呼吁性的文章在报刊发表，其中记得有一篇是发表在南京

《中央日报》的，题为《公教人员薪给问题之理论与实际》（有关具体情况见“索引”说明，以下同）。现在看来，那些真是“对牛弹琴”和“与虎谋皮”的书生之见。

该院在学年结束之前，已继续预聘我为教授。因为地处内战前线，加上院长易人，人心思散，恰逢中山大学王星拱校长派专人北上招聘教授，出于对中山先生的景仰和中山大学学术环境的了解，我便欣然应聘，经上海南下广州。没有想到，这一来就呆了 59 年多，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广东”了。

在中大，我所在的院系是法学院政治学系，根据聘书约定，我所担任的课程是行政学、市政学和行政法三门。其中行政法还供外系学生选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短短的两年内，我作过多次学术演讲和在各报刊发表过多篇专业性的文章。内容较多的是关于市政学的，也较多地刊登于上海的《市政评论》杂志。我与该刊主编并不相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机会见面，可惜他已作古。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学术研究条件已很困难，但是院里还想方设法，继续出了一期《社会科学论丛》。我的一篇题为《官僚制度与民主政治》的文章就发表在该刊。

说学术研究条件困难，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当时内战方酣，反动当局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民间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中大进步师生再也坐不住了，先后掀起抢救被迫害师生，罢教、活命大拍卖等活动，得到社会广泛深刻同情和大力支持。更有甚者，反动当局还策划把中大迁往海南，于

是而有护校斗争。明争不成，便实行暗斗；强阻不行，便设法拖延。结果是解放大军迅速解放广州，迁校终成泡影。

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夕教授们的生计艰难，只能勉强维持、苦撑。除物质条件外，开展学术研究还有精神环境问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动辄犯禁，得咎，处境之难，可想而知。营救被迫害的进步师生，就是因为他们勇敢地参加了示威游行的正义斗争。有些遭解聘的教授，无一不是由于他们有进步背景或曾发出正义的呼声。因为，正直的学者们，都非常欢迎早日解放和一个安定有序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到来。

二、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的再学习和担任的教学任务

若非亲身经历，真是难以置信。广州解放一夜之间，社会秩序大变样了。全校师生员工，莫不欢欣鼓舞。军管会的接管小组很快就进校开展工作，还成立协助接管工作委员会，我受聘为其中的一员，分工主要是法学院的学习工作。首先抓学习，在客观和主观方面都有必要。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在社会实践中学习

重视学习，应当认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各项工作进程中的极其显著和重要特点。有进步要求的高级知识分子很赞赏这种工作方式，更因为这种学习不只是简单的政治宣传。而是颇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内容，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系统的理论著作或有理论分

析和事实根据的正式文件等。

在解放后接管之初，我们学习的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史》等专题。后来还为教职员举办夜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以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经典著作为主，以及《中共党史》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课程。对于以后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很有帮助。

学习不限于书本知识，还有在社会实践中学习，才能真正体现理论结合实际的根本原则。这些社会实践很多，如至“文革”前有：整顿金融秩序、思想改造、土地改革、司法改革、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大跃进”、反右斗争、反右倾、人民公社、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四清”）等运动。参加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有缺点或偏差，也早已作了历史总结。对教学研究有直接影响的是课程改革和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这将在下一个专题中集中述及。

（二）教学研究内容的重大变化

在解放初期，各院系有各自安排的课程之外，增加了全校或全院性的“大课”。全校设置“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我也是委员和任课教师之一。最早的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都是面向全校的。我们是边学边教，进行集体备课，大家都觉得新鲜和得益不浅。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

与此同时，各院系也进行了暂时性的课程改革，我

原担任的“行政学”改称“行政组织与管理”，“行政法”改为“政策和法令”，只有“市政学”名称照旧。学生对市政学很有兴趣，在教学计划中除课堂讲授外，还率领学生到市区考察市政设施和进行现场讨论，教学都较有收获。以叶剑英同志为第一任市长的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城市计划委员会，聘请中大工学院研究古建筑的龙庆忠教授和我担任委员职务，也表明人民政府对城市建设的重视。我本已决定新编一本《市政学大纲》，并已由北京一出版社预约出版。可是，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计划未能实现。

院系调整的结果是原政治学系被撤销，师生基本上并入在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个别调往武汉大学。但是我仍留校转教《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和担任教研室的工作。对此，不免有些不解和感到纳闷，几门停授的学科还不时挂在心上。例如，在20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我就曾在《政法研究》刊物上发表过关于应重视行政法研究的建议。由于课程停授，相关研究随之终止。后来在本校学报发表的文章除关于宪法和共同纲领的以外，主要是关于马列主义教学方面的。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关于改进教学方法的意见。不过这一段经历对我有很大帮助，即在后来至今的学术研究中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也加强了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时间没有白费。

在1960年，中大哲学系复办时，宣布招生的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哲学专业，另一个是政治学专业。我被调任哲学系副主任，负责分管后者。可是，不知究竟为什么，真正是昙花一现，一年后政治学专业又被撤销，